

成的一种文化。它也能够被认作是一种革命文化、革命精神，薪火传承，代代不熄，从井冈山、遵义、延安、西柏坡，一直到总书记提出‘红船精神’，再到如今上海要追溯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‘建党伟业’的峥嵘岁月……何谓不忘初心？就是一定要知道来时的路。红色文化、红色经典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深远影响、宝贵经验、思想理论体系等等，无论对战争年代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、改革开放风雨历程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，所以，一定要大力提倡红色文化。”

19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当时只有13位代表；而到了党的十九大，2287名代表，全党逾9000万名党员，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——“难道这还不值得研究吗？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富强，如英、美、法等，都是通过侵略、掠夺的手段达到的，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，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赢得了胜利的果实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了‘两个一百年’的宏伟目标，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兴奋。进入新时代，红色文化依然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光辉的明天。”张黎明信心坚定。

谈及“建党在上海”，张黎明富有洞见地指出，“一大”代表13人，且多为南方人，这些精英何故选择上海？因为交通便捷、通信发达、印刷业发达，马克思主义在传播，上海成了工人阶级的摇篮。此外，当时的“一市三制”，在客观上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生存空间。“因此，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是必然的。我再举个例子，‘一大’两位共产国际代表，

红色文化、红色经典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深远影响、宝贵经验、思想理论体系等等，无论对战争年代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、改革开放风雨历程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后来没去嘉兴南湖，毕竟是外国人，不方便——而上海是国际大都会，什么面孔都能进来，什么人都能容纳。在这里，你可以重新出发，为自己铺好一条通往成功之路。中共中央自1921年建党到撤离上海，长达12年的时间内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革命旧址和遗址。”

江南文化支撑了海派文化、红色文化

关于为什么“多为南方人”、为什么在江南、为什么是上海的问题，熟谙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亦很有发言权。他将红色文化、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贯通起来审视，“建党也有一个文脉，事实上，我们应该考虑到，江南文化支撑了海派文化，间接支撑了红色文化”。

李天纲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若干坚实的论据。比如，江南文化的典型案例——朱家角，是商务印书馆创建者夏瑞芳的故里。而商务印书馆一个最出名学徒的名字，叫陈云——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练塘古镇，算来离朱家角不远，亦属于“红色染过的江南”。跟随陈云的足迹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“江南—海派—红色”的线索，三者交缠，促成佳话。

无江南，不海派。可从江南文

化中孕育的海派文化，实际上也离不开一位重要的“助产士”，即“维多利亚文化”。李天纲认为：“维多利亚时代，一般定义为19世纪3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，而我们上海开埠是在19世纪40年代，那么在租界里形成的那种现代文化，我觉得可以称之为上海的维多利亚文化。当时，杨浦区的杨树浦路一带，都是水厂、发电厂、煤气厂、纺纱厂、肥皂厂……上海近代工业爆发式的生长，杨树浦是最好的范本之一，所谓‘杨树浦奇迹’。我们的锯齿状红砖厂房、各种各样的工业管道，和香港、孟买、悉尼，包括旧金山、西雅图的，形制都差不多……维多利亚时代吹来的西风，姑且视为洋派，这洋派文化和我们原有的江南文化碰撞之后，相互渗透、吸收、学习、改造，于是，海派文化诞生了。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是不同的，它还融合了洋派，不要忘记有这么一个过程。（博采众长）这部分的内容是最主要的，北京、广州、青岛、汉口、天津……它们当年在‘开放、创新、包容’方面被上海甩在身后，是因为我们有抢先的势头，我们是中西合璧的海派。至今，上海依然自豪地走在时代的前沿。”

世人常有偏见，谓魔都崇洋媚外，对此，李天纲强调，海派文化固然崇洋——崇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；却决计不媚外，上海抗入侵、反压迫的斗争，上海的民族主义运动，